

经贸合作专题

# 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 逻辑与影响\*

苏庆义 桂子豪

**内容提要：**冷战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国际分工的不断加深，多边的世界贸易组织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成为主要的经贸合作框架。但自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对世贸组织和自贸协定的重视程度显著下降，转而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框架。本文梳理美国自2020年以来建立的新型经贸合作框架，并与传统的自贸协定进行对比，从经济、政治、战略三个层面及国内国际两个维度分析其转变逻辑，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新型经贸合作框架的前景及影响。本文认为，美国构建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大概率不能达到美国预期的战略效果，只可能在个别领域降低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当然，其对全球产业链的重新安排和布局也会对协定内的国家或地区带来一定的福利影响，对世界经贸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同样有一定影响。对中国而言，随着美国大力推进“美国体系+非美体系”的建设，中国在参与全球分工时无疑会受到不利影响，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也将受到影响和冲击。

**关键词：**中美竞争 国际经贸合作 自由贸易协定 供应链 高科技产业

**作者简介：**苏庆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桂子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 (2024) 03-0002-23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编号：DF2023ZD33）的阶段性成果。

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可以理解为，国家（地区）之间为保障经贸合作而建立的制度性框架。常见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包括多边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区域性的自由贸易协定（FTA）。二战以来，各国长期将世贸组织作为主要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20世纪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以来，随着世贸组织谈判功能的弱化，自贸协定逐步成为主流的合作模式。美国也曾长期将世贸组织和自贸协定作为主要的合作模式，但随着2017年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其合作模式逐步由以世贸组织和自贸协定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以宏观框架安排与一系列细分领域的协定或同盟为主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正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所指出，美国主张超越传统的自贸协定，建立以应对时代的核心挑战为重点的创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sup>①</sup>。这里的新型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就是本文所指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

美国在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合作框架。一方面，在宏观框架上，美国主导制定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等一系列区域性综合协定。另一方面，美国在各关键细分领域主导了一系列联盟或协定，如“下一代G”联盟（Next G）、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等。随着美国签订的协定逐步增多，其特征也逐渐明晰。

本文研究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内在逻辑及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对当下美国建立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框架进行梳理，并对其特征进行总结，然后分析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原因，研判这些合作框架的前景，讨论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研究有助于在理论层面理解美国主导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在实践层面把握美国主导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前景，从而为中国进行有效应对提供启发。

## 一 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典型事实

近年来，美国国际经贸合作模式逐步转型，建立了许多新的经贸合作框

---

<sup>①</sup>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e White House, April 27,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2023-10-17\]](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2023-10-17])

架。这些合作框架从合作形式、合作领域、合作目的、合作的针对性等方面都区别于传统的合作框架。

### （一）美国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框架

美国对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立场转变有一个过程。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首先退出奥巴马政府大力推行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搁置与欧盟谈判的《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并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美国经贸合作模式转型初现端倪。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特朗普政府还花费很大精力与中国谈判不需要国会通过、总统签字即可生效的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经贸合作模式全面转型，新政府积极推动新型国际经贸规则体系的构建。这些规则体系形式多样，既有综合性的宏观框架，也有一般性的针对具体领域的合作协议、伙伴关系、合作论坛、联盟、框架等。同时，参与者呈现多样性，既有国与国、国家与地区、国家与国际组织的双边合作，也有涵盖多国、多企业的多边合作。近年来，美国共主导推进相关协定37项（见表1）：2020年6项，2021年13项，2022年12项，2023年初6项。按内容分，除了综合性的宏观框架，还可细分为高科技领域、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矿产领域、医药领域、航空领域等五大类，成员涉及80个国家和地区。

在宏观框架方面，美国积极推进多项框架协定，并取得一定成效。从参与成员角度看，其成员覆盖范围广且覆盖地区重要。美国几大宏观框架涵盖美洲、欧洲、亚太、中东等地区，既包括美国的盟友，也包括全球主要的地缘政治焦点地区。这些国家或地区是拜登政府基于“友岸外包”“近岸外包”理念构建新型贸易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区域。从协定内容看，涵盖领域也很广泛，不仅局限于贸易问题，而且涵盖供应链安全、技术合作、数字经济、反腐败、劳工、环保等议题。如印太经济框架着重关注贸易、供应链弹性、清洁能源和去碳化、税收和反腐败等四大支柱。

从细分领域来看，美国围绕供应链安全进行了多领域布局，重点涵盖关键矿产、基础性和高科技领域：高科技领域有21项，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有2项，矿产领域有4项，医药领域有1项，航空领域有2项。高科技领域中，有6项为高科技领域框架、6项为互联网领域、5项是关于半导体行业，还有4项是在人工智能领域。从参与成员来看，供应链的关键国家均有所涵盖。如矿产领域的协定涵盖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重要的矿产供应国，医药领域囊括了国际主要的医药厂商等。高科技领域合作绝大部分局限于发达国家和地区

或美国的一些重要盟友，发展中国家基本被排除在外。其中，核心技术基本局限于七国集团（G7）、欧盟、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从协定内容来看，不单局限于产业合作，还包括供应链上下游的合作以及国际标准的制定等。

表 1 近年来美国建立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框架

类型	框架名称	时间	参与方
宏观合作框架	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 (TTC)	2021年6月成立，2021年9月举行首次会议	美国、欧盟
	美日贸易伙伴关系	2021年11月启动	美国、日本
	印太经济框架 (IPEF)	2021年10月提出，2022年5月正式启动	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斐济
	美台 21 世纪贸易倡议	2022年6月启动	美国、中国台湾
	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 (APEP)	2022年6月提出，2023年11月举行首次领导人峰会	美国、巴巴多斯、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墨西哥、巴拿马、秘鲁、乌拉圭
	I2U2 集团	2022年7月成立	美国、印度、以色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21 世纪美英经济伙伴关系框架	2023年6月启动	美国、英国
高科技领域框架	共同代码：民主科技政策联盟框架 (AFDTP)	2020年10月提出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韩国、英国
	“四方峰会”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 (QCETWG)	2021年3月成立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
	美日竞争力和弹性伙伴关系 (CoRe)	2021年4月启动	美国、日本
	美韩科技创新伙伴关系	2021年5月启动	美国、韩国
	美日商业和工业伙伴关系 (JUCIP)	2021年11月启动	美国、日本
	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 (iCET)	2022年5月启动，2023年1月举行首次会议	美国、印度

高科技领域	互联网	“下一代 G” 联盟	2020 年 10 月成立	正式会员：来自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瑞典、中国台湾、德国的 AMD、苹果、高通、微软、爱立信、诺基亚、三星、英特尔、台积电等 33 家企业
		美日全球数字互联互通伙伴关系（GDGP）	2021 年 5 月启动	美国、日本
		四方高级网络小组（QSCG）	2021 年 9 月启动	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印度
		跨大西洋数据隐私框架（TADPF）	2022 年 3 月启动	美国、欧盟
		全球跨境隐私规则论坛	2022 年 3 月成立	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中国台湾、澳大利亚
		互联网未来宣言（DFI）	2022 年 4 月启动	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台湾、欧盟、日本、以色列等 61 个国家或地区
	半导体	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	2021 年 5 月成立	正式成员：来自美国、韩国、日本、欧洲、中国台湾等地区的 74 家企业
		芯片四方联盟（Chip4）	2022 年 3 月提出，2022 年 9 月举行首次司局级官员预备会议，2023 年 2 月举行首次正式会议	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
		美马合作备忘录	2022 年 5 月签署	美国、马来西亚
		北美半导体会议（NASC）	2023 年 1 月提出，2023 年 5 月举办首届北美半导体会议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美印半导体供应链和创新伙伴关系的谅解备忘录	2023 年 3 月签署	美国、印度
		人工智能	全球人工智能伙伴关系（GPAI）	2020 年 6 月启动
美英人工智能合作伙伴关系（CAIRD）	2020 年 9 月启动		美国、英国	
人工智能国防合作伙伴关系（AI PID）	2020 年 9 月举办首届会议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爱沙尼亚、法国、芬兰、德国、以色列、日本、韩国、挪威、荷兰、新加坡、瑞典、英国	
人工智能促进公共利益行政协议（AAAIPG）	2023 年 1 月签署		美国、欧盟	

基础设施投资	“重建美好世界”（B3W）伙伴关系	2021年6月启动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
	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I）	2022年6月启动	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意大利
矿产	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	2022年6月启动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芬兰、法国、德国、日本、韩国、瑞典、英国、欧盟
	可持续关键矿产联盟（SCMA）	2022年12月成立	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日本、英国
	北美关键矿产资源测绘（NACMRM）	2023年1月启动	美国、加拿大、墨西哥
	美日加强关键矿产的供应链协定	2023年3月签署	美国、日本
医药	医药数据共享联盟（Accumulus Synergy）	2020年7月成立	由阿斯利康、安进、阿斯泰来、百时美施贵宝、葛兰素史克、默克、杨森制药（强生旗下）、礼来、辉瑞、罗氏、赛诺菲、武田组成，成员企业向联盟提供资金支持和初始应用开发。企业国别包括美国、瑞士、法国、英国、日本等
航空	美欧大型民用飞机合作框架（US-EUCFLCA）	2021年6月启动	美国、欧盟
	美英大型民用飞机合作框架（US-UKCFLCA）	2021年6月启动	美国、英国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绘制。

## （二）美国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与传统模式对比

2020年至今，新冠疫情和传统安全风险交织，国际格局正处于加速调整期，大国对抗重回世界政治舞台<sup>①</sup>。基于这一时代背景和美国国情，沙利文指出，当下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主要有以下几个目的：致力于为美国打造多元且富有弹性的供应链，促进对清洁能源和可持续经济的发展，促进就业，确保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和开放，停止企业税的“逐底竞争”，加大对劳工和环境的保护，打击腐败等<sup>②</sup>。在这些目标指导下，美国政府正在全方面推进国际

<sup>①</sup> 张蕴岭、朱锋、杨伯江：《大国战略博弈与国际形势新趋向》，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6页。

<sup>②</sup> “Remarks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Jake Sullivan on Renewing American Economic Leadership a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The White House，April 27，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4/27>. [2023-10-17]

经贸新体系的构建、有针对性地制定一系列合作框架。以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印太经济框架、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等宏观框架为代表，美国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已初见雏形。通过对2000—2016年间以及2020年至今美国签订的贸易协定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美国现阶段塑造的新型经贸合作模式与传统自贸协定主要有以下四点差异。

一是从合作的形式来看，美国不再追求谈判和签署自贸协定，转而借助更具灵活性的协定或者其他合作框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不再追求关税谈判和市场准入机制，而是追求超越传统贸易的多元化的合作框架。传统的自贸协定往往追求降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关税水平并减少关税壁垒。2023年，美国的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经低至2.4%，处于历史低位，关税谈判的要价能力较低。此外，进一步降低关税和放开市场准入还会冲击美国国内相关行业发展，引发美国国内相关利益集团的反对，也有悖于拜登政府的“重振美国制造业”计划。<sup>①</sup>因此，美国政府基于现实需求多元化地构建国际经贸框架，涉及的领域和范围更加广泛。以印太经济框架为例，美国基于本国经济政策需求，合作内容不局限于贸易，整体合作形式更加多元。这一阶段与欧盟签订的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及与美洲国家推进的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同样具有这一特点。（2）此阶段的宏观框架为模块化设计，分模块谈判。整个协定并不要求每个成员完全同意，而是各个模块分别进行谈判。例如，在印太经济框架谈判中，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负责第一支柱，商务部负责后三个支柱，这几个支柱之间互不影响。在后续的谈判中，各个成员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其中的任一支柱，如印度从一开始就没有参加贸易支柱的谈判。（3）这一阶段美国政府逐渐采用行政协议的形式而不是国会批准的形式执行协定。这样做的好处是协议更加灵活，不必像传统的自贸协定一样等待美国国会的批准，仅需总统签字即可生效。但这也可能带来不确定性的问题：一是后续美国可能根据需求的变动而修改相关协议的内容，二是这些行政协议并不具备法理上的保障和约束力。<sup>②</sup>

二是从合作的领域来看，新型国际经贸合作不再局限于传统货物贸易，

<sup>①</sup> 孙立鹏：《“印太经济框架”对华影响初评估》，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2022年7月29日。<http://www.cicir.ac.cn/NEW/opinion.html?id=d68c85df-9e98-47dc-8ad4-80c21526bae9>。[2023-10-17]

<sup>②</sup> 李鸿阶：《“印太经济框架”的意涵、影响及其前景剖析》，载《亚太经济》，2023年第1期，第1-9页。

而是聚焦关键矿产、基础性和高科技领域的深层次合作。传统的自贸协定主要关注传统货物贸易领域，并不会着重考虑产业链布局。但现阶段，美国重新塑造的国际经贸规则已不单单局限于传统货物贸易领域，而是涵盖产业链上下游、囊括经济政治等多个方面。其中，美国重点关注关键矿产、基础性和高科技领域，这些领域对于全球的经济稳定增长和科技进步具有重要意义。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不仅有高科技领域的整体协定，如“四方峰会”关键和新兴技术工作组；也有半导体、人工智能、互联网等关键领域和新兴领域的具体协定，如半导体领域的美国半导体联盟。美国致力于筑起“小院高墙”，以强化其在高科技领域的绝对竞争力、维系综合国力的领先地位。美国将技术划分为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核心技术与非核心技术，对核心技术进行管制，同时也进行非核心技术的国际交流<sup>①</sup>。而在关键矿产和基础性领域，美国出于确保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力推供应链本土化、近岸化和友岸化，从而保证在关键矿产和基础性领域的供应链掌控力。

三是从合作的直接目的来看，由传统自贸协定关注的提升贸易福利与效率转为当下的效率与安全并重。在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中，基于布什政府时期提出的“竞争性开放”战略和《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美国致力于促进贸易发展。<sup>②</sup> 而特朗普上台以后，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美国已不再通过传统的经济思路构建国际贸易体系与规则，而是从供应链安全角度出发，着力构建稳定可靠的供应链圈子。例如，拜登政府上台仅一个月就签署了关于强化供应链的行政命令，并于同年年底召开第一届全球供应链韧性大会<sup>③</sup>，推动构建更有弹性、多样化和安全的供应链。<sup>④</sup> 美国除了推进一系列关键领域供应链回流之外，也通过签订区域协定或制定规则，在不同的区域形成不同供应链属性的圈子，形成“回岸生产”+“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供应链与制造业模式，以保证其核心产品的供应链稳定。在这些领域的合作，拜登政府始终强

<sup>①</sup> 黄日涵、高恩泽：《“小院高墙”：拜登政府的科技竞争战略》，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133-154页。

<sup>②</sup> 王中美、徐乾宇：《战略排他与规则重构：试析美国FTA的贸易政策涵义》，载《国际商务研究》，2021年第4期，第3-15页。

<sup>③</sup> “FACT SHEET: Summit on Global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o Address Near - Term Bottlenecks and Tackle Long - Term Challenges”，The White House, October 31,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10/31/>. [2023-10-17]

<sup>④</sup> “Executive Order on America’s Supply Chains”，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4,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presidential-actions/2021/02/24/>. [2023-10-17]

调盟国的重要意义，主张基于意识形态壁垒构建稳定且安全的技术同盟、供应链联盟，并坚持采用制度规范与非军事化手段进行合作。通过在外行动、政策协调、产业联动等方面保持一致与协调，实现各领域供应链的安全可靠，将核心技术与高科技产业限制在美国、欧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内。

四是从合作的针对对象来看，排除中国的意图明显。之前的自贸协定往往是从经济角度出发，主张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社会福利，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政治意图。奥巴马政府时期，虽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排斥中国参与，但美国仍希望中国未来可以加入，以在接纳中国的同时引导中国的政策行为，并建立合作性的中美关系框架。<sup>①</sup>但从特朗普政府开始，美国排华意图更加明显，虽然也希望通过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约束中国，但在之后的协定中完全排除中国参与的可能。整体来看，美国致力于构建排除中国的联盟小团体，助推欧洲、美洲、印太等盟友圈建设，重点打造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并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区域性排他协定或合作框架达到排除中国的目的。其中，印太地区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地区，在该地区打造的印太经济框架更是排斥中国。具体而言，美国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排挤中国：（1）重新塑造地区和行业供应链，尤其是在芯片半导体等领域；（2）在数字贸易和数字经济领域进行多轮谈判，主导印太地区数字经济规则的制定；（3）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吸引非政府力量共同抵制“一带一路”建设，构建对华战略集合体。<sup>②</sup>除了限制中国参与一系列协定外，美国还限制协定成员与中国进行进一步的贸易合作。特朗普政府时期谈判的《美墨加协定》（USMCA）中的“毒丸条款”意在通过禁止缔约方与非市场经济国家缔结自贸协定，达到阻碍加拿大、墨西哥与中国谈判和签署自贸协定的意图。<sup>③</sup>此外，美国还在《美墨加协定》中对汽车行业原产地规则进一步细化，从原材料到零配件本土化率均有所限制，且对劳工薪酬也有更高要求，以限制协定

<sup>①</sup> 金灿荣、刘世强：《奥巴马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载《美国研究》，2009年第4期，第39-50页。

<sup>②</sup>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

<sup>③</sup> 沈伟、胡耀辉：《美式小多边主义与美国重塑全球经贸体系》，载《国际论坛》，2022年第1期，第3-24页。

以外国家的相关产品进入北美地区。<sup>①</sup>

## 二 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逻辑

在梳理了美国构建的新型经贸合作框架并与传统框架进行对比之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底层逻辑或者原因是什么？下面试图从经济、政治、战略三个层面以及国内国际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 （一）经济原因

在经济层面，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既有国内层面的原因也有国际层面的原因。国内层面主要是美国自身经济面临诸多亟须解决的约束，国际层面主要是受到中国崛起和全球供应链受阻的影响。

#### 1. 国内经济

其一，美国收入不平等问题持续恶化，工人就业问题严峻，传统自贸协定难以为继。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最基本问题。过去 50 年里，美国国内社会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由 2010 年的 0.4 上升至 2021 年的 0.49，为历史新高<sup>②</sup>。美国收入最高的 1% 的家庭财富总净资产在 2021 年首次超过占人口总数 60% 的中等收入家庭的总净资产<sup>③</sup>。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指出，签订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类的自贸协定不仅会损害美国的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减少美国的工作岗位，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sup>④</sup>。这是美国工会和中产阶级极力反对的。美国部分民众同样认为，美国并不是自贸协定的最大获益国，自贸协定不仅没有改善美国的经济状况，反而进一步恶化了国内劳动力市场和产业发展。美国难以协调国内的利益受损集团，因此诸如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安排《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很难在国会获得批准<sup>⑤</sup>。

<sup>①</sup> 廖凡：《从〈美墨加协定〉看美式单边主义及其应对》，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43 - 59 页。

<sup>②</sup> 数据来源于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库。https://data.census.gov.[2024 - 05 - 23]

<sup>③</sup> 张梦旭：《美国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载《人民日报》2021 年 10 月 19 日第 17 版。

<sup>④</sup> Robert E. Scott and Elizabeth Glass,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Currency Manipulation, Trade, and Jobs",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March 3, 2016. https://www.epi.org/publication/trans - pacific - partnership - currency - manipulation - trade - and - jobs/#epi - toc - 14.[2023 - 10 - 17]

<sup>⑤</sup> 彭可为、李文韬：《TPP 最新动向、展望及中国策略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8 年第 1 期，第 110 - 118 页。

其二，美国贸易逆差和外债持续上升，亟须调整外贸政策。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贸易逆差和对外负债持续上升。尤其是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基于此，特朗普政府自上台起就明确要求将削减巨额的贸易逆差作为其贸易政策的重要目标，并通过一系列单边贸易调查、提升关税及非关税壁垒等政策实施保护。拜登政府大多继承特朗普政府在经贸领域的保护主义。因此，美国摒弃传统的自贸协定，转而构建保护主义、“实用主义”的新型贸易规则<sup>①</sup>，致力于打造更有利于美国本土经济发展的国际经贸规则。以北美自贸协定为例，自其签订以来，墨西哥已成为对美贸易最大的拉美国家。美国不仅不是该自贸协定的最大受益国，在某些生产部门贸易福利甚至有所下降。如图 1 所示，在美墨经贸关系中墨西哥长期保持顺差，且数额逐年上升。因此，美国着手摒弃北美自贸协定，重谈该协定并重新命名为《美墨加协定》，以平衡美国与墨西哥、加拿大两国的贸易逆差，着重考虑在北美自贸协定中缺失的劳工与环境问题，吸引更多企业回岸生产，彰显“美国优先”的美式小多边主义。<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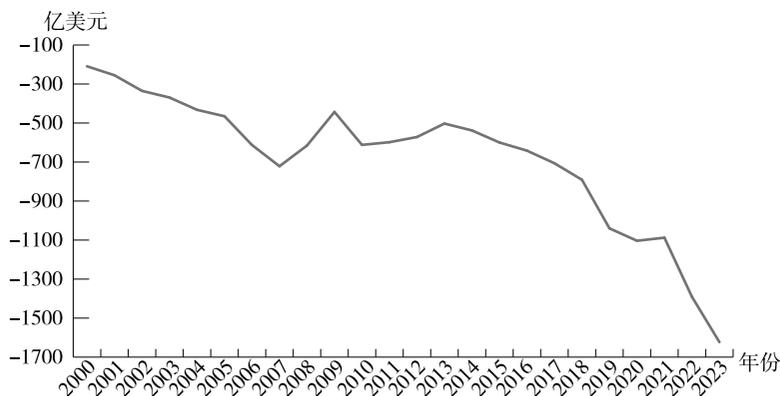


图 1 美墨双边贸易差额

资料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库。https://www.bea.gov/data.[2024-05-23]

其三，美国整体关税水平已经很低，通过自贸协定降低关税已无必要。如前所述，美国进口关税水平已经很低，下降的空间已经不大。美国长期以来一

<sup>①</sup> 王孝松、张瑜：《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化的影响探究》，载《经济学家》，2022 年第 5 期，第 107-116 页。

<sup>②</sup> 王学东：《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缘起、发展、争论与替代》，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1-22 页。

直在推动关税降低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但由于关税水平较低，再签订传统自贸协定的意义已经不大。且美国认为，自身关税水平已经很低，而其他国家关税水平很高，即便降低关税也应该是让其他国家降低关税。另外，美国关税水平低意味着美国的要价能力也低，很难通过降低关税的让步来换取谈判方的让步。相反，美国在制定国际贸易政策时可考虑更多元化的因素，比如与贸易伙伴合作、加强产业合作、促进创新和技术转移、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等。

## 2. 国际经济

其一，中美经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自 2016 年起，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计算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中国超越后，美国 GDP 占全球的比重逐年下降，中美之间的份额差距逐年扩大。如图 2 所示，截至 2022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已占世界的 18.22%，美国则下降至 15.28%，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从全球价值链角度来看，中国整体处于下游地位，但是却表现出向中上游攀升的趋势<sup>①</sup>，这无疑将挤占美国在这些环节的份额。随着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受到威胁，其拥有的国际权力也会出现明显衰退<sup>②</sup>。基于此，美国正试图在技术与关键产业领域保持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以维持其在全球价值链网络中的地位。因此，构建某些领域的高科技联盟成为美国国际贸易政策的新选择与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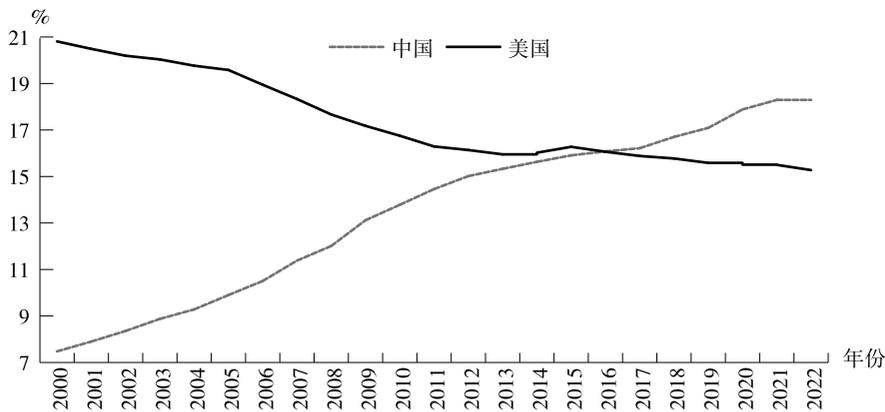


图 2 中美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不变价）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绘制。<https://data.worldbank.org.cn> [2024-05-23]

<sup>①</sup> 程惠芳、刘睿倪：《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中美参与国际分工分析》，载《华东经济管理》，2018 年第 1 期，第 92-101 页。

<sup>②</sup> 余南平：《全球价值链对国际权力的形塑及影响》，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第 120-137 页。

其二，受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全球供应链上下游严重受阻。自新冠疫情以来，由于美国全球供应链运行受阻，美国不断将供应链安全与弹性放在国际贸易的突出地位，主张供应链“去风险”。在新冠疫情期间，美国通货膨胀持续升高，特别是在运输和物流行业，疫情期间口岸的一系列供应链中断和延误导致美国进口商品价格创下历史新高。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国内商品尤其是防疫物资的短缺，许多商超在疫情期间保持着较高的商品短缺率。疫情期间暴露的供应链问题是美国极力避免的。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就曾发布关于供应链安全的报告<sup>①</sup>，拜登就任总统后美国更是反复强调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要求供应链“去风险”。基于此，拜登政府大力发展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供应链，同时在海外致力于与美国的友岸、近岸国家开展更紧密的合作，并确保全球供应链不受其他国家的影响和控制<sup>②</sup>。传统的自贸协定显然无法解决供应链脆弱性问题，只有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框架才能增强美国的供应链韧性。

## （二）政治原因

从政治角度看，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同样受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国内方面主要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转向保守，国际方面主要是中国等新兴国家崛起对现有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带来挑战。

### 1. 国内政治

从美国国内角度考虑，其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主要受国内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盛行的影响。自由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遭到否定，美国走向贸易保护主义。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推进了一系列国际贸易和国际治理体系的构建，极大地推动了全球化发展。但随着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均出台一系列措施以带动本国经济复苏。同时，民粹主义开始在欧美盛行。民粹主义会显著影响国家的贸易政策选择，执政党会倾向于选择逆全球化操作<sup>③</sup>。基于民粹主义和贸易

<sup>①</sup> “National Strategy for Global Supply Chain Security”,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3, 2012.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sites/default/>[2024-01-06]

<sup>②</sup> “The Biden - Harris Plan to Revitalize American Manufacturing and Secure Critical Supply Chains in 2022”, The White House, February 24,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4.](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2/02/24/) [2023-10-17];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Increasing the Supply of Semiconductors and Rebuilding Our Supply Chain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1, 2022.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1/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2/01/21/)[2023-10-17]

<sup>③</sup> 冯国强、孙瑞、张新然：《民粹主义如何影响执政党的贸易政策选择——来自欧洲 31 个国家的经验证据》，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 年第 2 期，第 145-157 页。

保护主义内核的共同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以民粹主义为底色的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就呈现出极其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在国际贸易领域，自贸协定这类与贸易保护主义相悖的政策逐渐受到工商界及政客的一致反对，相关议程在国会也逐渐被否定，美国转向构建美国绝对主导的保守主义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这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历届政府中均有体现：奥巴马政府奉行“实用主义的自由贸易”主张，不排斥自贸协定谈判，但在谈判中要求维护美国的绝对主导地位；特朗普政府则直接抛开自由主义的面具，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主张，极力推动贸易保护政策（尤其是在新兴行业），并试图在国际规则构建中遏制他国<sup>①</sup>；拜登政府则延续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基调，提出“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力图恢复美国的国际贸易领导力，试图构建美式小多边主义。这些都助推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构建新型国际经贸合作规则与体系。

## 2. 国际政治

从国际政治角度分析，中国因素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在原有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中对美国形成了全面挑战，使得美国需要重新构建国际经贸规则体系。

首先，从现有的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供给能力看，美国无力继续提供全球贸易治理的公共产品。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美国提供传统全球贸易治理机制的能力和意愿有所下降，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有意更多地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美国构建的贸易治理体系受到挑战，全球贸易治理体系面临再平衡<sup>②</sup>。

其次，从现有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机制来看，其作用已极大受限。当下的多边贸易制度主要是依托世贸组织构建，但目前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作用受限、经贸谈判的功能有所弱化、监管机制的效率较为低下<sup>③</sup>。世贸组织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与一揽子的承诺方式已不适用于当下的国际贸易治理。

---

<sup>①</sup> 王孝松、张瑜：《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化的影响探究》，载《经济学家》，2022年第5期，第107-116页。

<sup>②</sup> 张晓通、陈实：《百年变局下中美全球贸易治理的竞争与合作》，载《国际贸易》，2021年第10期，第21-27页。

<sup>③</sup> 刘玮、徐秀军：《发达成员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的议程设置分析》，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第164-172页。

美国已无力主导一揽子协定谈判，且全员一致通过贸易议题已经越来越不可能<sup>①</sup>。

最后，对于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改革方向，美国同样受到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挑战。美国主张对世贸组织的规则体系进行革命性的变革，要求全球贸易体系服务于美国利益；而中国则主张在世贸组织的基础上保持开放，推动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反对贸易保护主义。

基于这些国际政治因素影响和挑战，美国同样有意图和动力去构建新的国际经贸合作体系以维护美国本国利益，保护本国经济安全及政治安全，并在小多边体系中对美国进行打压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

### （三）战略原因

战略原因同样有国内和国际的共同叠加影响。在国内战略方面，美国转向重振本国工业发展；在国际战略方面，美国与中国战略竞争的逻辑已由市场竞争转变为国家竞争。

#### 1. 国内战略

从美国国内角度考虑，美国国内战略重心已转向振兴本土工业发展，并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就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这与美国国内的政治思潮是同步的。这对美国的产业发展和经贸合作都有巨大的影响。这个战略要求低端制造业回归美国以增加国内就业，同时保持高端制造业竞争力。但由于美国过高的劳动力成本，其本土制造业成本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在美国制造生产与资本的逐利性相悖。因此，美国只有将自身脱离全球经济，实施“逆全球化”战略，才能保护本国产业并推进本土工业发展<sup>②</sup>。新冠疫情后美国通过进一步强调供应链弹性引导本土工业发展，这在美国主导的各个协定框架中均有体现。

#### 2. 国际战略

从国际战略角度考虑，大国经济竞争逻辑发生变化，由市场竞争转变为国家竞争。随着中国崛起，中美之间崛起国与守成国的竞争关系日益明显。就美国而言，其经济竞争逻辑已由自由主义的市场竞争转变为保守主义的国

---

<sup>①</sup> 程大为：《美国治下全球贸易体系的变化及中国贸易治理对策》，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8 年第 9 期，第 97 - 109 页。

<sup>②</sup> 苏立君：《逆全球化与美国“再工业化”的不可能性研究》，载《经济学家》，2017 年第 6 期，第 96 - 104 页。

家竞争，试图直接阻止崛起国的经济积累<sup>①</sup>，构建崛起国无法逾越的经济与科技壁垒。

自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经济快速增长，谋求经济利益就是美国发展全球关系的主要动力。在这一阶段，美国着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经济体建立并发展经贸关系，政治与安全等方面的分歧都会让位于经济联系<sup>②</sup>。而自美国从国际金融危机中逐渐复苏，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逐渐摒弃了之前的市场竞争逻辑，转而构建基于国家竞争这一底层逻辑的新型大国经贸关系。在经济领域，特朗普政府秉持“美国第一”的国家安全观，经济安全被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也被视为美国的头号经济竞争对手<sup>③</sup>。

国家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国家整体地位不受到挑战和冲击，是基于政治或安全层面的考量；而市场竞争的目的是为了争取国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是基于经济层面的考量。进一步来说，市场竞争考虑的是绝对收益，是一种共赢逻辑，其效用函数可以简单表示为本国福利（公式1）；国家竞争考虑的是相对收益，是零和博弈，其效用函数可以简单表示为本国福利与外国福利的差值<sup>④</sup>（公式2）。

$$U_{\text{市场}} = f(Y_{US}) \quad (1)$$

$$U_{\text{国家}} = f(Y_{US} - Y_{China}) \quad (2)$$

$U$  表示一国获得的效用或收益， $Y$  表示通过经贸联系获得的福利。

若一国考虑的是绝对收益，则着重于本国经济福利的最大化。根据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该国倾向于与外国进行贸易合作，尽可能地减少经济壁垒和贸易壁垒限制。这样做往往会同时最大化本国和外国的经济利益。相反，若对国家竞争的考量占据一国决策的主导地位，该国往往倾向于维护国家安全，本国收益是否增加并不重要，本国和外国收益的差距很重要，合作并不是该类国家决策中的首要选择，遏制打压可能是最优选择。对于美国而言，其改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底层逻辑在于其关于大国经济竞争的逻辑已由追

① 肖河、潘蓉：《大国经济竞争策略的选择机制》，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6期，第1-40页。

② 吴心伯：《竞争导向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转型》，载《国际问题研究》，2019年第3期，第7-20页。

③ 吴心伯：《论中美战略竞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5期，第96-130页。

④ 夏广涛、张宇燕：《理解国家行为：一个基于相对利益的国家效用函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1期，第67-94页。在此文中对该效用函数进行了更为细致的推导，本文采用了简略的表述方式。

求绝对收益的市场竞争逐渐转向追求相对收益的国家竞争。

### 三 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前景和影响

美国推动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可能发生不同的演化情景，不同情景将带来不同的影响，包括对相关国家或地区的福利、对经贸体系与规则、对全球产业链等方面的影响。

#### （一）对美国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前景分析

对于美国国际经贸合作模式转型的未来前景，从成功到失败，依次存在如下四种情景。

情景一：美国成功塑造“安全”的、涵盖各领域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国所有领域均被排除在美国打造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外。

在此情景下，美国成功稳固其在各产业链的绝对领导地位，中国等国家被排除在美国布局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外，在事实上形成中美平行体系<sup>①</sup>。这一情景的实现在各方面都有诸多困难，并不太可能实现：一方面，美国目前倾向于构建的国际经贸体系并非涵盖各领域，对于农业、纺织业等传统行业关注点较少，而是着重于关键矿产、基础性和高科技领域；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当下的经济体量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美国并不可能构筑一个全领域、完全排斥中国的产业链以及相对应的国际经贸和分工体系。即使美国可以在各个领域与中国脱钩，其盟友也无法做到在经济上与中国完全脱钩，如澳大利亚就陷入经济上倚靠中国而政治上倚靠美国的状况<sup>②</sup>。

情景二：美国成功塑造关键领域的“安全”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国在关键领域均被排除在美国打造的全球产业链体系之外。

在此情景下，一方面，美国成功实施其“小院高墙”的科技战略，事实上确立了其在全球高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并通过一系列规则制度将后发国家的科技水平限制在一个无法与美国及其盟友竞争的区域；另一方面，在其

<sup>①</sup> 翟东升在《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一书中指出所谓“平行”，是指2010年夏以来美国在科技、经贸、资本等各个领域与中国的“脱嵌”进程不断加速，愈益决绝，导致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逐步分裂为两个相互平行、相互竞争的体系。参见翟东升著：《平行与竞争：双循环时代的中国治理》，北京：东方出版社，2021年，1-31页。

<sup>②</sup> 刘新华、王多月：《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绝对收益与相对收益视角下的澳大利亚战略困境》，载《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7期，第30-53页。

他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领域如关键矿产、医药等，美国形成了“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布局，其主要原材料的采集及后续产品的加工生产均位于中国之外的友岸、近岸国家。美国在这些领域与中国形成了事实上的脱钩，在这些领域的生产不会受到中国的限制。此外，美国还通过各领域的一系列联盟和协定使其近岸国家和盟友在这些领域的生产摆脱中国的影响，在高科技领域中断与中国的合作。

情景三：美国仅在个别关键领域成功塑造“安全”的国际经贸体系，其余部分关键领域无法排除中国的参与。

在此情景下，美国无力实现拜登政府对规锁中国、振兴美国制造业、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所有目标，只在个别关键领域实现了产业链不受中国影响。在剩下的关键领域及其他领域，美国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产业依赖，中国仍然对美国的全球战略和新型国际经贸制度构成挑战。美国的盟友们出于利益考量，同样面临类似的问题——在经济上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在政治上也无法坚定地支持美国。但对于某些美国领导地位比较明显的领域，如高科技领域，则可能形成排除中国影响和参与的产业链。

情景四：美国最终未形成任何关键领域的“安全”的国际经贸体系，中国仍在各领域进行全球生产与贸易合作。

在此情景下，美国出于某些原因并未如愿建立稳稳地排除中国的国际经贸和产业链安排，中国与美国继续维持包括高科技领域在内的多领域合作与经贸互补。这一情景在目前来看并不存在实现的基础：一方面，美国在一些领域拥有绝对的领先地位并掌握着规锁中国的能力，当下已经通过法规和国际制度安排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对中国部分领域的生产和发展的限制；另一方面，美国从动机上并不太可能放弃对华战略遏制，美国制定的规锁中国、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方向不太可能改变。

在概率上，上述四种情景中，情景一和情景四并不存在实际发生的可能，短期内看不到实现这两种情景的物质基础。情景二和情景三在中短期内更有可能实现，即美国的经贸合作模式转型产生了一定效果。美国目前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转型目标就是以情景二为目标。美国强调通过较为灵活的合作模式保证其关键领域的生产链位于本国或者近岸、友岸国家，且避免中国在这些领域对美国形成挑战和冲击。

美国正大力推进情景二的实现，其主要依赖于：一方面，美国现阶段构建的合作框架谈判难度较小、易于获得批准，且预期该类型会成为美国构建

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美国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在参与国上大多为美国与其盟友合作的形式，这对于美国而言也比较容易获得支持。若美国的盟国和中立国均对美国的国际安排较为配合，且中国并没有明显反制措施的话，形势可能向情景二发展。

然而，对比情景二和情景三，情景二实现的概率仍然较小，情景三实现的概率可能更大，也就是说美国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构建可能取得一定成效，但难以达到预期目标。其主要原因是，美国构建的国际经贸合作新模式对其合作伙伴来说收益有限，部分国家并不愿意选边站队。正如本文上一部分的分析，美国构建国际经贸合作新模式的出发点是基于相对收益的国家竞争，但是其他国家政策制定的原则和出发点并非如此，它们也难以赢得国家竞争的收益。其他国家更多关注出于经济考量的绝对收益，主张考虑传统经贸合作中的市场准入等推动经济合作的实际内容。基于此，本文认为最终达成情景三的概率更大。

从影响程度来看，从情景一至情景四对中国的负面影响依次递减，情景一对中国最为不利，情景四对中国最为友好。结合上文分析，大概率会出现情景三，小概率会出现情景二。如果美国在个别关键领域摆脱了对中国经济的依赖，且对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关键零部件进出口进行限制，中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及其产业链地位都将受到一定影响。

从产业链类型来看，中国各类型产业均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中国产业链将受到美国政策冲击，会有一定程度的向外转移。在高科技产业链（如半导体），中国面临巨大的封锁压力，其自主研发生产难度将大大提升，在产业链中的加工生产地位也将受到遏制。在关键矿产产业链，中国在大部分矿产资源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可能被弱化，美国推动的矿产联盟将减少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整体来看，实际情景越趋向于情景二，中国受到的影响越大。

## （二）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的具体影响

### 1. 对协定内国家或地区的福利影响

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对于协定内的国家或地区有一定的福利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协定内的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贸易会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但其福利效应难以评估。这些框架和联盟虽然大多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和硬性要求，但大部分涉及某一区域内或某一行业领域内的产业链布局 and 安排。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该地区或行业领域内的产业合作，引导区域外的产业链上下游

向区域内转移，以拉动协定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及贸易发展。美国新塑造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不包含市场准入及关税谈判相关内容，所以其相较于传统自贸协定将带来多少福利效应难以评估，但其产生的直接影响一定不如传统自贸协定显著。具体分析福利产生的来源，可以预见短期内这些协定安排带来的贸易创造部分会明显少于贸易转移部分，因为其主要是政府政策影响企业的产业布局，而不是企业基于市场情况的自发决定。

## 2. 对世界经贸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的影响

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对世界经贸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同样有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全球层面来看，美国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速国际体系阵营化。该合作模式本质并不是全球化的多边制度安排，而是基于美式小多边主义、只涵盖部分国家的制度安排，并试图重塑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全球贸易体系和规则安排。这种合作模式针对性和排他性极强，合作伙伴国主要集中在欧盟、美洲和亚太地区，而且排斥中国的意图明显。美国一方面从物质层面出发试图打造安全可控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另一方面从精神层面出发，试图塑造意识形态对立，如在“T-12”论坛<sup>①</sup>的塑造中着重强调“技术民主”这一概念、在印太经济框架中标榜“共同民主原则与普世价值”等，试图形成阵营对立。

第二，从亚太区域层面来看，东盟和印度在经贸体系中的地位上升，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继续呈现碎片化。亚太地区是美国安排产业布局的重点地区，同时也是美国遏制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地区。随着美国将中国排除在其产业链合作安排之外，美国多个协定安排均将印度及东盟国家放在重要地位，印度及东盟在该地区将更多承接中国的部分产业转移。从区域合作框架来看，亚太国家自亚洲金融危机后就积极推进亚太区域经济合作，最终形成有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该区域目前有正在谈判的印太经济框架，还有日本主导的已经生效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此外还有诸多双边自贸协定、次区域合作。这些合作框架之间难以整合，呈现出交织的“意大利面碗”现象<sup>②</sup>，亚太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sup>①</sup> 为了应对中国“威胁”，美国与英国、日本、德国、法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澳大利亚、印度、以色列等国组成“T-12”论坛，共同促进科技发展的“规范和价值观”。

<sup>②</sup> 徐梅：《RCEP 签署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载《东北亚论坛》，2021年第5期，第56-67页。

面临更多挑战，其经贸合作更显碎片化。

第三，在规则层面，美国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或将引领全球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过往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更多地考虑关税和市场准入等国际贸易因素，旨在推动全球自由贸易。而美国的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目的是通过印太经济框架等协定推动各国更激烈的竞争，最终削弱中国经济优势。基于此，美国的新模式在很多规则机制方面都有新的设定，如组织架构、战略方式、合作形式等<sup>①</sup>，这些都将极大地影响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的构建。美国在其盟友支持下，或将引领未来的国际经贸规则。

### 3. 对全球产业链、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及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美国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对全球产业链、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及中美经贸关系同样有一定的影响。

第一，在全球产业链方面，原有的“美国—德国—中国”三中心的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将转变为“美国体系+非美体系”格局。美国通过“回岸生产+近岸外包+友岸外包”替代之前“离岸外包”的生产布局策略，改变了近30年来形成的全球产业链格局，以确保该产业链格局是美国认为“安全可控”的，并在此基础上构筑新的发展格局。在“美国体系”中，主要分为以七国集团（G7）为主的发达国家阵营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阵营，前者为美国的科技战略和高科技产业服务、确保形成对全球科技进步的垄断；后者为体系内国家提供农矿产品等低附加值产品供应并负责中低端产品的制造和劳动密集型生产，保证美国基础资源、关键矿产、中低端制造品供应的安全可靠。对于“非美体系”国家（主要是亚洲、非洲的部分国家），美国刻意通过规则安排将其排除在外，阻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区域内国家之间的价值链融合。

第二，对中国而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将受到一定限制。美国以供应链安全及意识形态对立为由，将中国置于美国构筑的全球产业链之外，中国被迫面临高科技领域发展受到打压、中低端产业部分产能向外迁移的发展困境，参与全球分工受到影响，中国不得不减少国际循环。对于高科技领域，美国严格执行的“小院高墙”战略将中国的高科技企业排除在美国规划的高科技产业链之外；对于中低端产业领域，美国在各个协定中均推行“回岸生

<sup>①</sup> 赵蓉：《从 TPP 到 IPEF：美国亚太经济战略的制度创新》，载《现代国际关系》，2023 年第 3 期，第 46-61 页。

产+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的生产布局，中国部分产能或将向越南、印度等美国友岸国家迁移。

第三，中美经贸关系将继续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对于中美关系来说至关重要，尽管拜登总统表示美国及七国集团当下的政策并不是要与中国经济脱钩，而是“去风险”和与中国关系多样化<sup>①</sup>，但事实上中国已经逐渐远离美国规划的全球产业链的国际分工，中美经贸关系已逐步由竞争转向对抗和冲突。中国已由2020年之前的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下降为2022年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国。虽然中短期内美国无法摆脱对中国的产品依赖，但在投资、高科技等领域加速与中国脱钩。在产业层面表现为中美在中低端产业暂时无法脱钩，但在高端产业逐步直接脱钩，其形式可能转变为基于第三方（如东盟地区）的间接挂钩。

#### 四 结语

当下，美国的国际经贸合作模式正全面转型。美国摒弃了它自冷战结束以来全力助推的经济全球化的底层逻辑——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促进全球经济贸易一体化发展，转而采用其他灵活的框架协定，以建立一套旨在确保其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可控、遏制中国等国家的发展为目的的国际经贸规则。2017年以来，美国通过一系列协定的签署和国际联盟的构建，已逐步形成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这不同于以往的以自贸协定为主的国际贸易合作模式，在合作形式、合作领域、合作目的、合作针对对象等方面均有显著差异。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转变国际经贸合作模式主要是出于经济、政治、战略三方面原因。美国国内经济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使得自贸协定已不适用，国内政治趋于保守化和民粹化使得自贸协定受到全面抵制，由此，美国转而大力扶持本土制造业发展。此外，美国在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均受到中国崛起的挑战和冲击，其国际战略也全面转变为与中国的国家竞争。

---

<sup>①</sup>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a Press Conference”, The White House, May 21,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3/05/21/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a-press-conference>. [2023-10-17]

从前景和影响来看，本文认为，美国最终可能在它具有绝对话语权的某些关键领域成功塑造“安全”的国际经贸体系。基于美国及其盟友的体量，这一新型国际经贸合作模式会对其他国家的贸易福利带来影响，并进一步影响当下的世界经贸体系和国际经贸规则。同时，美国的安排也会对全球产业链和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造成一定影响。这不单单会影响中国的高科技领域，其构建的“美国体系 + 非美体系”格局同样会冲击中国的中低端制造业，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也会受到冲击。

整体来看，尽管美国出于一系列原因对国际经贸合作模式做出改变，但美国的战略并非注定成功，美国及其盟友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中国应基于本国国情审视并制定本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保持战略定力和底线思维，坚持改革开放，坚定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发展。

(责任编辑 黄念)